

历史是古人活动的舞台，文化则是其中积淀而成的传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与文化是精神与思想的遗传基因，对现代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出其本源，揭示中国传统世界的内核，便是别裁。

历史之源 ● 人生之鉴 ● 智慧之裁

中国历史文化的兴替与别裁

张耐冬 著

DUSHI BEICAI

读史别裁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历史文化的
关键话题

张耐冬 著

DUSHI BIECAI

读史别裁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史别裁：中国历史文化的关键话题 / 张耐冬著.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753-386-3

I. 读… II. 张…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K 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37443号

责任编辑：李毅男 黄梅然

全案设计：蓝狮书装

读史别裁：中国历史文化的关键话题

张耐冬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82-9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87900345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 / 16 印张17.5 字数240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53-386-3

定价：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中国历史文化的关键话题

历史是古人活动的舞台，文化则是其中积淀而成的传统。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与文化是精神与思想的遗传基因，对现代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出其本源，揭示中国传统世界的内核，便是别裁。



大众历史读物要有传播价值观念的担当

——张耐冬《读史别裁》序

刘后滨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尽说蔡中郎。

陆游的诗句，给人以某种享受。村头村尾、斜阳古柳下，人们劳作之余，三三两两，漫不经心，谈论着历史上的人和事，这该是多么惬意的一种生活境况啊。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之前，我生长的村庄里，依然还有闲谈历史故事的传统。陆游的时代还没有大的城乡差别，文人对乡村生活并不陌生，不存在“草根”一说。陆游所说反映了一种很深厚的文化传统，谈论历史故实，一直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中后期。

历史知识不应该属于小众，尽管历史研究是专家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来有所谓“公众史学”的说法，而且大洋两岸、海峡两岸都在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众史学”项目（Public History Program）。该课程项目开办于1980年，主要培养目标是编写地方史和社区史、历史遗迹保护、文化资源管理、与历史相关的行政管理、博物馆工作、公共政策史编写以及学术出版编辑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公众史学”专业方向，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这个方向的覆盖面很广，对于我们制定新的本科人

才培养目标和教学方案，非常具有参考意义。历史系绝对不能只培养历史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中国国内尤其是大陆地区，目前学术界和媒体对“公众史学”的理解，基本还局限在“大众读物”或“普及读物”的意义上。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语境基础上的。大众文化中的历史知识，不等同于公众史学。公众史学是由专业机构来培养从事与历史相关工作的专业人才的历史教育，强调的是历史学的专业属性。而国内的所谓大众历史读物，卖得好的，基本都不是历史学专业人员写的，基本上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有历史学专业人员放不下身段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历史学专业人员长期受到的学术训练比较刻板，适应了论文体的写作，又要严守规范，很难写出适合大众口味的文字来。所以，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还是遵循着古已有之的勾栏瓦肆、说书讲唱的传统。

这个传统也没什么不好，而且普及历史知识不见得非要和时髦的“公众史学”扯上关系。问题在于，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需要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在这个方面，当前存在着很混乱的状况。历史知识的普及一定伴随着潜移默化的价值传播，正如本书中所举《三国演义》的例子，三国史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三国之所以成为各种文化和价值讨论中的大案例，原因在于《三国演义》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去演练了一番，或者说是寄托了在历史和现实中实践价值体系的梦。很难说《三国演义》所要实践的价值观念都过时了，但是它所代表的整个价值体系肯定是不适合于当代社会的。从媒体上能够看到，不少人都在讲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可很少有人关心历史知识普及背后的价值观念的传播和价值体系



的重建。甚至由于没有梳理清楚不同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普及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一些极端事件。这应该引起从事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教师、学者的思考。

耐冬是那种勤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学人。在我所接触的不同代际的史学界同行中，他那种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的探讨中关注价值观念及其传播的读书取向，显得非常突出。我本来不赞同他在个人专著出版之前先出版一本学术随笔集，怕他陷入不务正业之讥。看完书稿后，觉得很有思想，而且有那种关注价值观念及其传播的自觉。所以，我稍微改变了态度。

耐冬作为一位年轻的大学历史教师，经过正规的史学训练，知识面很广，叙事技巧和对一些关键细节的考证，都颇见功力。不过，这并不是本书最突出的地方。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历史表象背后价值的关怀，是分析和思考，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他尽量用现代的理性思维去理解历史上一些典型的事例。对于人们耳熟却并不能详的一些历史故事，书中细致地加以拆分，一步一步进行分析，对于故事的出路或结果，提出多种可能性，然后通过排除法，得出历史自身呈现出来的结论，并分析出为什么只能是这个结果的道理。书中讲的道理，事关价值体系，都是大道理。但不是空洞地讲道理，而是建立在大量的细节描述基础上。尤其是通过对各种可能性的分析，把故事本身说得更加透彻，更让人记得住细节，印象深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叙事方式，作者称之为“别裁”，当深含此义。

这是一部既长于叙事又关注价值的学术随笔，不同于一般的所谓历史智慧、政治谋略、人生哲理之类的文章，也不是读者文摘式的随感。书中关心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关键话题，既不猎奇，也没有故作高深，

所举事例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典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但我敢肯定地说，不仅对于非专业的读者，即使对专业研究人员来说，有许多也都是耳熟而不能详的。从学术角度看，本书类似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专题论集，而且有着避免“鸡零狗碎”和“云山雾罩”双重尴尬的自觉。这就使本书具备了很大的可读性和较强的学术性，尽管不是用论文体的文字写出来的。

作者出生于70年代，90年代中期上的大学，是能够同时理解区分度很大的两代人（50—60年代人和80后）的一代学人。书中对许多历史细节的分析，都是娓娓道来，如同当面对谈一般。这很符合“很少打电话，却经常发短信”、“不想用声音交流，只想用文字沟通”的当下生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人在孤单无聊的时候，总是想找一个聊得来的人说说话，可是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且人们对谈话对象的选择也越来越挑剔，所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通讯录和手机上存的所有名单翻个遍，结果还是一个合适的、可以闲聊一会儿的人也没有找着。这是现代人生活的困境之一。所以，人们为了满足表达的需要，就去建论坛，开博客，设空间，写日志，总是希望等别人有空有心情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即使如此这般，也还总是让人失望。在这个文化也成为快餐的时代，不妨去翻看一本既有精彩叙事又讲了许多道理的历史书。

这本书让我想到了许多，借题发挥，是为序。

2008年11月20日

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

这是一个看上去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同时也是很多人都试图回答但语焉不详的问题。“了解过去”、“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多些认识”、“学习古人的经验”和“从历史中寻找借鉴”之类的理由，似乎都言之成理，但都不够充分。

在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这样一首“中国历史朝代歌”：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这首歌谣朗朗上口，也确实比较适合学生背诵。似乎另有一首比较复杂，笔者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前两句：

夏商西周和东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这种“朝代歌”的形式，一直以来是历史教学的主要方式，和古代的启蒙教育有些共通之处。久而久之，我们只记得朝代名称和著名人物。但为何会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代战乱，却总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教科书上所讲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与变化万端的中国历史对照起来，总显得过于抽象，难以在历史中找到对应之处。

因此，我们只满足于对历史故事和历史过程的了解，而这些了解，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上下五千年》。泱泱大国的历史认知水平，停留在青少年水平，这总是个问题。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就曾经在《新史学》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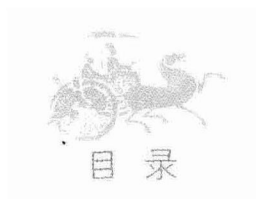
中对中国的传统史学进行过批判，他归纳出了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其中最具启发性的，就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所谓“铺叙”，就是对历史过程、历史故事的讲述，让人们在听故事中了解过去，但也仅此而已。而所谓“别裁”，就是在铺天盖地的历史资料中取其精华，用自己的思想、眼光和认识将其重新组织起来，这样写出的历史，有框架、有脉络，更有高度与深度。

如果从梁启超的角度来观察，在他发表《新史学》之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历史书籍还是以讲述过程、描绘细节为能事，而描述脉络、阐述思路的著作，却少得可怜。更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些动辄纵论几千年中国历史，对各个时代挥斥方遒的作品，则几乎无一出自历史学专业人士之手，而大众只能接受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以讹传讹的情况时有发生。

以“别裁”形式来讲述历史，目前已是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的工作了。因此，笔者不揣鄙陋，愿意抛砖引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若干核心问题进行评说。

就像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读史的过程中，确立一个完整的历史坐标系，然后在上面找出当代的位置，自己的位置，其实是读史的最终目标。就学科内容而言，历史学研究的目标是求真与探究历史规律，但求真之后当然要求善、求美，探究规律之后自然也要思考规律对现实的作用，因此，本书力求在论述之间，为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实、认识自身的参照系，以期能够让读者体会到读史与阅世之间的互动。



目录

“权”：古老的博弈命题

不是谁都能选择背叛	003
权变的罪与罚	011
霸主的难题	022
德与法的盲区	031

堕落与自赎：士大夫沉浮史（上）

儒与侠的混合体	045
夭折的“独立精神”	055
堕落换来的发展	067

堕落与自赎：士大夫沉浮史（下）

深渊中的挣扎	081
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098
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	112

极端的年代：一页吃人的历史

秩序是罪恶的温床	127
豪门恩怨的权力场	136
零乱的“吃人”现场拼图	146
沙场外的决战	153

细节中的“大历史”

忠臣为何变成叛徒	163
----------------	-----



自然寿命与天下兴亡	176
囚徒命运与“皇帝新装”	187

大案例：文化资源生成史

“三国”何以成为大案例	203
俗与雅：大案例的双重变奏	210
再造“国魂”	217
“大案例”不是哈哈镜	223

阅读他者：读史者之间的对话

影视是否需要史学	231
文本临摹：历史书写的误区	238
“借鉴史学”的罪与罚	245
在启蒙与媚俗之间游走	256

后记	260
----------	-----



“权”：古老的博弈命题

QUAN GULAO DE
BOYI MINGTI

“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它不但道出了古代政治的精髓，更是将中国的政治哲学一言蔽之。“权”字在政治领域的含义大概可分两类：一是权力，二是权变。“权”的这两重政治含义不但与古代政治密切相关，更和现代博弈论有对接的可能。博弈论在很多时候能够对以“权”为中心的古代政治作出精细的分析。

汉字是一种神奇的符号，从古至今，不但每个字的字型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而且字义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说，弄清楚了一个字的含义演变，就等于研究了一部中国文化史。

这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汉字字义的演变，不但是凝固着的文化史，更是被尘封的政治史。当腥风血雨、刀光剑影在时光的侵蚀中渐渐淡去，留下的只是简单的几个字，让后人细细品味。

在我看来，“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它不但道出了古代政治的精髓，更是将中国的政治哲学一言蔽之。

“权”字在政治领域的含义大概可分两类：一是权力，二是权变。权力这一含义，大抵是从“秤锤”这一含义引申而来的，表示举足轻重的力量和关键性因素，这恰恰是政治活动的核心，即实力与地位；权变这一含义，基本可以等同于权谋，即以谋略为指导而进行的策略调整。

权力与权变，就像兵法中所讲的“奇”与“正”，相辅相成，构成了政治活动的主体。对政治而言，更有意义的一点是，如果只有权力而无权变，就会出现赤裸裸的专制和暴力；如果只有权变而无权力，则只能是巧言令色而无实际行动。这个道理，被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法家大师韩非子归纳出来，就是三个字：法、术、势。

按照今天的理解，权力就是势，而权变则是术，将二者糅合在一起，使权力与权变都在可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则是法。由此可见，“权”在政治领域中的含义，正是法家思想的核心。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我们就会发现，“权”的这两重政治含义不但与古代政治密切相关，更和现代博弈论有对接的可能。博弈论的研究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理性人”应对各类问题时的对策制定与选择。乍看上去，似乎博弈论研究的只是“权变”，但对策选择实际上与实力、地位息息相关，因此，博弈论在很多时候能够对以“权”为中心的古代政治作出精细的分析。



不是谁都能选择背叛

博弈论有很多分类方法,按照博弈双方的关系,可以分为合作性博弈与非合作性博弈。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非合作性博弈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要地位。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经常强调“和”与“不争”吗,怎么到了实践阶段,却又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了?

从利益的角度去看,如果“争”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和”,如何取舍就不言自明了;而如果“争”与“和”所获得的利益几乎相近,那么道德因素才会起到作用。

用道德来规范政治、规范政治家的策略选择,一直是古代思想家们的追求,但由于他们在实践层面缺少论证,因此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在经典中,我们读到的是一片祥和、天下为公,而在史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尔虞我诈、翻云覆雨。

因而,我们在史书中经常看到的,是背叛、出卖和陷害。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人道德沦丧,而是在更有诱惑力的利益面前,他们无法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

背叛的实力

中国古代的政治博弈,基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来概括,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博弈论最基本的道理:

两个朋友一起去深山里面游玩,结果遇到了一

合作性博弈,是博弈双方以共同利益出发,选择双方利益相对最大化的策略;非合作性博弈,是博弈双方以牺牲对方利益为实现己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

孟子就十分反感只谈利益而不谈道义的行为,因此他周游列国,到处宣讲“仁政”的道理,但他的雄辩却解决不了战国时代以实力说话的问题,因此他失败了。

只熊，他们都十分害怕。其中的一个人弯下腰把鞋带系好，作好逃跑的准备，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跑得比熊快。”那个准备跑的人回答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

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囚徒定律”的基本精神：背叛。

无论对方作出什么样的策略选择，背叛对方都能够让自己获得收益，那么必然要选择背叛这一道路。在这个“朋友和熊”的故事里面，那个准备逃跑的人面临的选择有以下几个：

第一种情况：不逃跑，被熊吃掉。

第二种情况：逃跑，比同伴跑得慢，被熊追上后吃掉。

第三种情况：逃跑，比同伴跑得快，熊吃掉同伴，自己得以生还。

当然，除了这几种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不逃跑，也不抵抗，熊不吃他们；不逃跑，抵抗，二人合力打败了熊；逃跑，被熊追上，但熊不吃他，而是超越他之后去追前面跑得快的同伴……但是，这些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只能用来锻炼一下思维，而对博弈论来说，研究的只是在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的策略选择。

在上述的这些可能性里面，如果选择逃跑，会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基本模型，指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人同时被抓，他们每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坦白，被减刑或无罪释放，要么抵赖，被加重惩罚或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但每个嫌疑人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都取决于另一人的选择。到最后，他们都会作出一样的选择，那就是都坦白，而这种选择，对共犯者而言，都是一种背叛。

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几个选择。对于选择逃跑的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逃跑，就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选择不逃跑，生还的机会自然属于他。朋友选择逃跑，就需要一个附加的条件——他跑得比自己的朋友快，这样才会生还。所以，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无论他的朋友作出什么选择，只要他自己拼命去跑，就会有生还，这是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模式。

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种思考并且作出选择的模式则十分常见，并且不断出现。

这个故事里面就有一个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淘汰最差者的原则。处于“囚徒困境”的时候，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好办法能让自己又从困境中逃脱，又能获得利益，只能尽量做到自己不受侵害，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然，如果“朋友和熊”的故事中，有一个人腿脚不便，那么无论他作出什么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他被熊吃掉。这种基本素质的缺陷，是策略选择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选择背叛也要有基本的实力。

背叛者的尴尬

翻开《左传》，第一篇就为我们讲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庄公，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共叔段。因为生庄公的时候不太



《左传》书影

《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典籍，据说为左丘明所作。因为它所记载的历史与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年代基本吻合，因而后来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